

空间辩证法与历史的效价

——论詹姆逊文化批评的哲学基础

章 朋

内容提要 基于后现代文化空间化的历史语境，詹姆逊通过恢复辩证法的时间性内涵，将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视为一种辩证叙事，认为其作为一个将多样性、差异性的历史统一进单一的世界体系的总体化运动，体现了一种“历史的效价”。对辩证法空间维度的拓展以及对时间或历史维度的强化，形成了詹姆逊独特的空间辩证法理论，他据此对资本主义历史进行文化分期，最终构成了其文化批评理论的哲学基础。但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詹姆逊并没有捍卫马克思思想的基础性地位，其文化批评理论更多地承袭了黑格尔抽象的肯定与否定模式，抽空了现实的具体情境，凸显了形式分析的优先性，也因明显的政治倾向遭到不少批判。某种意义上，詹姆逊以黑格尔式的雄心冲淡了其理论中的马克思主义成份，走向了“黑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者”。

关键词 詹姆逊；空间辩证法；时间；历史化；叙事

辩证法与历史化在詹姆逊文化批评理论中具有核心奠基作用，通过两种理论的融合，詹姆逊将资本主义的历史视为一种不断将多（多种生产方式）统一进一（单一的历史）之中的总体化运动。历史作为一种辩证叙事表现为不断推进的解放进程，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正体现为市场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和跨国资本主义三个辩证阶段的扩大蔓延；对应此三阶段则形成了三种不同的文化风格，即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詹姆逊通过调和黑格尔和马克思，融合时间与空间的双重维度，提出资本主义的空间辩证法理论与历史的效价说，为理解资本主义历史文化提供了工具，也构成了其文化批评的哲学基础。詹姆逊认为，借助现代性叙事的转义策略对社会历史进行分期诊断分析，可将人类不可见而又难以把握的历史转化为可见的文本形式，从而在历史与文化领域实现辩证转换。不过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詹姆逊并没有严格捍卫马克思理论的基础性地位，由于对辩证法时间性内涵的突出，且将历史予以绝对化处理，其文化批评理论更多地保留了黑格尔的因素。

一 辩证法及其时间维度

詹姆逊在当代学界是一位具有总结性意义的理论悍将，佩里·安德森高度评价詹姆逊所作出的重要贡献，认为他一方面继承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另一方面又深入统合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们对广阔的社会运动所采取的超然态度，呈现出某种唯心主义色彩，从而勾画了社会形式的整体转变，“达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顶峰”^[1]。不过这种“唯心主义”的胚胎随着詹姆逊思想的发展，逐渐显露出愈加明晰的轮廓，乃至冲淡了詹姆逊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身份。作为其文化批评哲学基础的辩证法和历史化，也因与历时的时间维度保持着亲密的内在关联，而更多地透露着某种黑格尔的意味。

通常认为詹姆逊成功地在黑格尔和马克思之间进行了融合，扬弃了黑格尔思想中的不合理性，从而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詹姆逊对马克思和黑格尔等思想不同程度的挪用不可避免地导致

其理论中的各种裂缝和冲突,并遭致诸多批评。批评的观点认为,詹姆逊在马克思与黑格尔乃至后现代诸理论之间进行调和,却又无法真正将对立的思想加以合理融贯^[2],抑或“想弥合黑格尔与马克思之间的鸿沟,却又没能克服它;他从黑格尔走向马克思,却又仍然停留在黑格尔思想的内部,以致其哲学遭遇一系列僵局或障碍,呈现出一种其自身也会将之批判为矛盾的形式”^[3]。他对辩证法的理解,某种意义上将辩证法等同于“历史”过程,因不断向抽象的时间性靠拢,辩证法被抽离为一种黑格尔意义上排除了具体内容的思维形式。詹姆逊征用马克思的理论,吸取其精华,最终又投入黑格尔的怀抱,在其后期具有哲学奠基性质的《辩证法的效价》《黑格尔的变奏——〈论精神现象学〉》等著作中,我们看到更多的可能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而是某种程度上对黑格尔的回归与改造,其理论中的黑格尔因素并非只是基于马克思思想的简单整合,而是具有基础性色彩。在《黑格尔的变奏——〈论精神现象学〉》中,詹姆逊将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视为一种展开的叙事,反对一种对《精神现象学》的“历史循环”或“历史终结”的读解,打开了黑格尔辩证法封闭圈的大门。《辩证法的效价》则是建立在黑格尔辩证法之上的对整个资本主义系统的历史哲学研究,正如有学者所批评的,这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如此重要的一部总结性著作中,“没有一章论述马克思”,可以说“是一出‘没有王子的《哈姆雷特》’”^[4]。这样一来,詹姆逊对辩证法的理解,虽融合了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却在黑格尔的视域中对其进行了最终改造,他断定辩证法“从根本上说是一个历时性过程”^[5],历史抽象成了时间性形式,马克思唯物主义的历史辩证法在此沦为黑格尔自我意识的精神运动。

詹姆逊的辩证法脱离唯物主义范畴,走向了抽象的形式范畴。无论从共时层面还是历时层面看,其辩证法都类似一种自动的螺旋转化机器,二元对立作为最基本的富于戏剧性的形式结构无止境地发挥作用,在不断遭遇对立面的过程中将对方内化或同一化,并呈现出整体向外扩张的姿态,形成一个巨大的漩涡,继而与外部世界构成新的辩证对立。

黑格尔封闭的或走向历史终结的辩证法在这里转变为一个不确定的、无限开放的体系,从而避免了历史的循环论、重复论乃至“绝对精神”的目的论。这是一种自我更新的、历时运动的、具有不断吞噬能力的形式框架,它与绝对的“历史化”和时间维度具有逻辑上的一致性。

就辩证法的具体内涵来说,詹姆逊主要突出的是辩证法的自反性。这是一种超越经验现实之上的自我意识或思维本身,尽管它一定程度上包含了对物质现实的反思。詹姆逊没有排除马克思的“资本逻辑”这一具体的物质内容,也不否认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之间的不兼容,但认为这种不兼容正是矛盾对立的具有创造性的空间,它最终以自我意识的形式整合转化为下一级或下一层面的新的矛盾,以拯救历史的停滞不前。继而,辩证法“与目的、叙事和历史有关,换句话说,与故事的变化、历时性,而非意识的种种结构有关”^[6],它呈现为一种螺旋上升的结构性的“阶梯形式”——结尾是开放的,而不是一种循环的或周期性过程,从而辩证法被理解为特定历史情境中的一套运作,在这个意义上,辩证法就是历史本身^[7]。在辩证法的基本结构方面,詹姆逊也重复了黑格尔的矛盾形式,并将其视为事物运动的秘密源泉。矛盾是生产性的,它借助辩证法本身实现转换和调和,并生产出新的矛盾。詹姆逊试图将多种元素的多样性建构为众多矛盾,每一个二元项都构成一种局部的辩证法,它们又共同构成一个拥有庞大体系的总体辩证法。这些局部的众多辩证法,主体与客体、贫与富、自由与奴役、左与右、高雅与大众,在詹姆逊看来,都将消融在一个大的、最初的二元对立之中,即伦理意义上的二元——善与恶,它是辩证法最基本的形式,也是最小的辩证法。二元论于是同样被抽离为一种思维形式,一个不稳定的结构和基本框架,正因此它能够包容一切复杂的异质材料,并不断扩大自己的结构形态。“矛盾是过程中的一个阶段,而不是一个静止的结构”^[8],辩证法是一个不断运作着的重新编序的过程,它通过对陈旧故事解码和重新编织叙事,使矛盾在成为一个空间概念范畴的同时也成为—个时间概念范畴。

矛盾双方无法通过消除对方来实现矛盾的解决,而只能将矛盾在特定空间中加以转移,不断地生产新的矛盾来缓解当下的矛盾。这种转移像德里达的“延异”无止境地运动下去,从而使时间和空间得以在辩证法内部实现辩证的统一和总体化,辩证法因此以一种螺旋上升的运动模式将众多局部辩证法或外部对立内化到自身结构中去,并在历史进程中进一步扩大自身。正是统一(同一)对多元(差异)的终极矛盾,塑造了没有内容的形式,并在时间中通过不断吸纳具体的物质内容而延展,产生一种所谓历史的推进模式。

詹姆逊的历史化理论与其辩证法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历史在这里被绝对化为历时性的形式化延展。尽管“永远历史化”是在后现代的特定语境中提出的抵抗后现代空间化和主体性丧失的策略,但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历史化比之传统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所要求的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反倒走向更为极端的语境化。伊格尔顿认为詹姆逊所谓的历史化是一个超历史的命令,本身就是一个历史行为,实际上是述行矛盾,它僵化了历史作为动态开放的过程^[9]。拉卡普拉认为詹姆逊的理论是旧瓶装新酒,历史化的必然后果是文本的僵化和对文本能动性的抑制,从而使历史只能成为一种死去的文献材料或档案记录^[10]。怀特更是批评詹姆逊的历史化不过是他所要建构的历史救赎故事的一种策略^[11]。这些批评表明詹姆逊所保留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成分不过具有某种添加剂作用,其主体思想却不断走向德里达、德勒兹等人所批判的黑格尔式形而上学模式,历史化不仅没有被具体化,反而被抽象成一种具有本体属性的形式本身。这意味着历史化作为一个颇具马克思主义特质的概念也最终被黑格尔化了。

詹姆逊对黑格尔思想的侧重使其不断增加历史、辩证法与形式化和“时间性”的内在关联,最终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和历史化进行了绝对化处理。尽管他强调个体与集体、时间与空间、文本与历史、共时与历时、内容与形式的辩证对立,同时认为辩证双方存在不平衡或者说不对称的结构形式——它是辩证法运动的基本动力,但在二元对立中,他最终必须突出集体、时间、历史和形式的

优先性,才能维持一种跷跷板式的动力学结构。因此,“历史”在这里退化成为一种绝对与抽象,历史就是辩证叙事,它以辩证运动的方式表现为一种螺旋式推进的时间—空间形式。

二 资本主义的空间辩证法

辩证法为理解资本主义历史提供了基本方法,也是詹姆逊重点改造的理论对象。当前的资本主义阶段比此前一切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更为复杂多变和难以把握,在资本主义分工细化和社会特征的破碎化方面尤为令人困惑,乃至卢卡奇所竭力辩护的现实主义文学最终不过是对资本主义表面现象的一种描绘,从而只能是一种假象,甚或成为与资本主义本身的认同。因此必须将资本主义社会当做一个总体来看待,在局部和总体之间进行转换思考。这种在差异和同一之间的转换借助的就是辩证思维,它提供了研究现实世界的方法,帮助观察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和运作过程,乃至能够产生一种可以解释资本主义及其未来发展趋势的理论。“辩证法是一种思维方式,是能够抓住——不会错过也不会扭曲——世界上任何角落里的各种真实变化及互动的一组相关范畴。”^[12]在当下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辩证法对分析资本主义世界的复杂境遇和未来走向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13]。詹姆逊对辩证法进行改造,突出了时间性在资本主义历史进程中的基础作用,并糅合马克思的“资本逻辑”,为黑格尔的“形式”增加了一项具体的阶级内容。由此,特定历史时期的共时维度,如后现代空间,被架构于时间性这一连续的坐标轴上,二者共同协作,呈现为一个无所不包的运动中的宏大立体结构,从而建构了一种关于资本主义历史的空间辩证法理论。

从历史的截面看,资本主义的发展是由其基本矛盾(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决定的,每一对矛盾都构成一个共时空间。这一基本矛盾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更无法从内部解决,马克思的商品形式也没有消除这一矛盾,但商品提供了一种转移矛盾的可能,使矛盾有一个可以移动的空间,正是在这种空间的运动过程中,一个矛盾不断滑向另一个矛盾。资本主义的矛盾就在这种滑动中得以缓解又得

以实现,从而不断拓展和蔓延。这就构成了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总体辩证法和一体化趋势,诸多共时性时刻的连续,形成了时间性延异,根据詹姆逊的论述,它是黑格尔辩证法在时间和空间中的进一步扩充,“黑格尔的体系本身在它的结构上呼唤后来历史中的实质性扩大:先是帝国主义阶段(或在技术意义上的‘现代’),现在是全球化阶段。这些后来的扩大非常符合黑格尔的辩证精神”^[14]。因此资本主义经历了从市场资本主义到垄断资本主义和当下跨国资本主义(全球化)三个阶段,但不同历史阶段的文化风格与表征都基于单一的资本主义现代性。

在市场资本主义时期,资本主义没有越出国家范围,19世纪末资本主义开始出现垄断扩张,进入帝国主义阶段。20世纪60年代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又出现了一些较之以前历史阶段十分不同的文化特征,消费文化的盛行和新技术、新媒体、广告形象的爆炸性普及,以及跨国工业的全球发展,表明资本主义进入了一轮新的发展阶段,使人们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已经过时。但曼德尔质疑资本主义在当下阶段所有的“新”特征,认为马克思曾论述只有在整个世界都进入资本主义后,才可能出现社会主义运动的成功,而当下的资本主义阶段恰恰是马克思所预言的最发达的也是比所有过去都更为“纯粹”的阶段,它并没有背离资本主义社会,反而是一种实现。列宁也曾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较之市场资本主义有一些辩证的变化,“所谓辩证,就是说这一个制度既可能是同一的,又会有差别”^[15]。因此如果说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是一种世界殖民主义的掠夺和暴力侵略,那么当下的资本主义同样发生了另一个辩证的变化,即进入了詹姆逊所说的以更为深入的文化渗透为特征的跨国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是对前一个阶段的辩证飞跃,并彰显出历史所具有的连续性特征,这种连续性的根本依据则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可以说,资本主义的每一次发展都是在同一生产方式中对自身内部矛盾和障碍的转移与突破,到第三阶段才出现了此前从未有过的新特征——全球化扩张和空间化。

20世纪60年代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转型阶段,“从古典资本主义幸存下来的‘自然’的最后痕迹最终在后资本主义下被彻底地侵蚀了”^[16],在全球化的蔓延扩张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文化形态像潮水般浸入乃至浸透世界各地的一切空间^[17]。资本主义从此进入后期发展阶段,其最为重要的文化表征就是历史感的消逝和空间化。“审美实践与文化实践对于变化着的对空间和时间的体验特别敏感,正因为它们必需根据人类体验的流动来建构空间的表达方式和人工制品”^[18]。这种空间化表征首先在建筑领域体现出来,因为建筑是人类生活最直接的领域,也是最迅速地得到反应的领域。詹姆逊以洛杉矶鸿运大饭店为例介绍了后现代建筑的空间化特征。这是令人迷失乃至无法找到出口的“超级空间”,主体一旦置身其中便丧失判断周围一切的能力,无法通过认知系统为自己确定一个位置和方向。它与我们当下所处的全球化世界——巨大的跨国企业横跨各地、信息媒介与网络传播全球占据的境遇是一致的,后现代的巨大转变就是现代时期对时间和历史感的突出逐渐让位给空间体验。“时间是隐喻或提喻的,空间是转喻的。时间关注同一性,空间突出差异性。在时间模式中,诸多意义被组织成一系列内部关系;在空间模式中,只剩下了外部关系,意义就像地图上的标识,相互之间仅仅是外在的(空间上的)关联。”^[19]从时间模式向空间模式的转变就意味着意义和深度的丧失,也是由同一向差异的转变,后现代与现代之间似乎发生了一次彻底的断裂,超出传统认知模式的后现代仿佛一种毫无征兆的突变,令人无法理解。

詹姆逊认为倘若不把整个资本主义当做一个总体,把后现代当做资本主义一体化进程发展的一个特殊阶段,这种不可理解在情理之中。因此必须对后现代进行总体化和历史化把握,将其视为资本主义辩证法的一部分,全球化空间的绝对差异性特征与现代时期的绝对同一构成了一种辩证结合。大卫·哈维将资本主义发展视为资本积累在时空中分子化运动的过程,是一种历史—地理的推进。他认为,后现代可以被看做是某种历史—地理状况,资本主义活动的地理学景观充满了矛盾与紧张,它

必须通过转移矛盾将资本盈余和劳动力盈余加以合理解决,这种矛盾的转移与缓解被称为资本主义的“时间—空间修复”,“喻指一种通过时间延迟和地理扩张解决资本主义危机的特殊方法”^[20]。时间—空间的地理扩张构成资本主义的整体发展规律,哈维继而认为,“如果我们的任务是理解这个世界同时改变这个世界,那么抓住时间和空间的辩证法将是一个重要的开始”^[21]。詹姆逊利用辩证法对资本主义的历史现实进行分析,借助总体性的中介,将现代和后现代进行关联。他认为二者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产物,这是其同一性,后现代对现代的反叛与空间化则是一种内部的差异化过程。同一和差异是相互联系无法分割的,总体性正是这种差异和同一的统一,是同一与非同一的矛盾性统一,因此“同一与差异的抽象对立被赋予了某种特别的内容,即统一对多元”^[22]。资本主义全球化作为其发展的第三阶段,是统一化过程的最高形式。

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由资本主义的终极矛盾推动,在时间和空间中不断延伸、辩证拓展,它以基本的二元对立为始基,衍生出众多局部的二元对立,并构成内部的差异和多元。在后现代全球化阶段,这种差异性表现达到最高峰。将现代时期的时间与后现代的空间从宏观上加以整合,时间和空间被新的空间所包容,资本主义的诸多局部辩证法于是构成一种总体辩证法,它随时间的推移以及在空间中的扩张,形成了一种不同于传统时间辩证法的新辩证法,即空间辩证法^[23]。“从市场占领到帝国主义的空间扩张以及现在的全球化,我们将能够瞥见在哲学、美学和经济政治层面上所要获得的优势,这种优势来自空间辩证法对古老的时间辩证法的取代。”^[24]但后现代的空间转换并不是对时间的彻底取消,而是空间与时间的比例发生了变化,现代时期的时间在后现代时期退居其次,让位于空间,却并没有消失,或者说古老的时间范畴被翻译成了新的空间表达形式,时间退隐至背景性地位。正因此,在空间辩证法中每一个时刻都是辩证的,同时是时间的和空间的。可以看到,詹姆逊将黑格尔自我意识的公式我=我(I=I)拓展成了一种具有时间进程的空间场,在时间性运作中,一个空间

场被另一个扩大的空间场浸透、侵占和吞没。在空间辩证法中,空间性保证了一种差异性和多元的状态,它赋予辩证法以内容,避免了辩证法空洞的自我同一性,而时间作为一种同一性的保证和源泉,使辩证法得以将多元统一。相对于空间的显现性特征,时间更具有本源意义,它是空间得以推进延展必不可少的基础坐标轴。

不可否认,詹姆逊整合了马克思的“资本逻辑”,他对资本主义的系统研究也以历史或时间的辩证法为基础,结合后现代空间特征,勾勒出资本主义从早期市场资本主义到当下跨国资本主义与全球化这一整个历史进程的文化逻辑。但詹姆逊对各家理论的兼容并蓄,对总体性视域和一元性的宏大追求,以及最终突出历时、形式的优先权,都可见出其文化理论中的某种黑格尔意味。又或可以说,当下这个时代与黑格尔的时代在某些方面有着极大的相似,詹姆逊致力于使自己成为当代的黑格尔,来完成一个时代的理论总结。他以总体性的方法,将当下全球化的历史改写为资本主义文化的蔓延史和资本主义体系的一体化过程,从而提出了颇具争议的单一的现代性与历史效价理论。

三 现代性叙事与历史的效价

根据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并以黑格尔的总体性范畴为参照,詹姆逊认为历史尽管存在很多种局部的断裂,有很多局部的多样的现代性,比如拉丁美洲的现代性、非洲的现代性、印度的现代性、儒家的现代性,等等,“但这会忽略现代性的另一种本质意义,即世界范围的资本主义本身的意义。……这个世界已经被一种普遍的市场秩序殖民化了”^[25]。各种不同的现代性最终被资本主义现代性与全球化浪潮席卷吞没,复杂多元的现代性被统合纳入一个总体且单一的现代性^[26]。诸多多元、差异之间的矛盾构成了否定之否定,最后仍要回归到自身的同一性。这种由多元向单一性总体的回归体现了一种时间或历史的综合性效价。

由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了一系列分离,如连续与断裂、同一与差异、主体与客体、系统与经验,等等,作为叙事范畴的现代性要在各种分离之

间进行转换,如在历时和共时的切换中进行多维度回溯、重复与往返,“叙事可以被描述为结构中的时间或时间中的结构——它独特地结合了共时和历时、时间和结构,因此可以被理解为从理论上克服现代性一系列问题最合适的方式”^[27]。就此而言,单一的现代性可以被视为通过单一叙事的方式重写现代性,试图将现代性中的分离再次统一起来。现代性叙事的单一性特征基本上与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同一性相一致,它是历史本身在时间中的一种转义性投射。同时,作为叙事的现代性“是一种方法,将把我们引向美学领域或现代主义里的一个相关的概念”^[28],它将资本主义不可见的历史转化为可见的文本,从而使资本主义的历史特点与其文化表征一致,保证其文化表征不仅能够反映特定历史阶段的基础经济状况,并能够与之产生互动。现代性在资本主义历史及其美学意识形态之间充当了一个中介,通过对现代性多种情景的意识形态叙事,历史被编进各种文本之中。

因此现代性叙事作为一种转义策略,是将历史与时间的多样性、差异性以及彼此之间的相互交叉、干预,理解为一种不和谐的结合。这种结合作为一个事件,携带着时间和历史的显现,诸多历史和时间的交叉,也就是将多种历史统一化为总体的绝对的历史,从而产生一种综合性效价的过程,它体现为对诸多历史或时间的统一、创造与再生产。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时间是关于前和后的运动的数,并且是连续的(因为运动是连续的)”^[29],根据这一定义,时间不是运动,但始终处于运动之中,时间本身是难以看见的,没有形象,只在运动中才得以显现,运动成为时间显现的中介,时间以某种方式隐身地在场。也即是说,我们无法从时间本身来讨论时间,而必须借助外在的哲学参考。如此一来,关于时间是什么的问题最终不过是在追问时间的形象,而不是时间本身。詹姆逊用“喻象”来指代时间显现的外在形式。时间不是运动,不是数,也不是空间,但它们的交叉呈现为一个“喻象”,“喻象”是诸多不可通约的表现形式之间的交叉。这种海德格尔意义上的交叉使时间显现出来,并成为一种方法打开了多元与差异的统一化趋势,将诸多时间和历史迅速转变为“一”——一种总体

的、永恒开放的,同时具有系统和事件双重视角的历史形式。这种“一体化”过程是借助诸多局部辩证法的矛盾运动和整体的辩证叙事实现的,通过叙事的表征可以看到,历史的旋涡犹如一台不断吸纳、综合与生产的机器。

面对诸多时间和历史的并置以及其间的诸种不兼容所呈现的鸿沟与悖论,需要一种“交叉理论”将其作为结构现象来加以解释。詹姆逊认为时间或历史的显现不是单单靠这些时间轨迹的多样性和差异性,而是它们之间的彼此干预和交叉接合。在这一交叉时刻形成了一个让事件出现的空间,它聚集了各种不和谐与不可通约性,并以综合的形式强化所有的多元性和交叉。在各种不和谐的时间性轨迹的交叉时刻,时间负载着集体的力量突然与个体相遇并发生撞击,对个体显现为一种超越个体的存在经验或现象学经验。詹姆逊回到亚里士多德的悲剧情节理论及其叙事结构——情节突变、发现(识别)和受难(怜悯),认为“这种叙事结构可以说‘生产’了历史,或更确切地说彰显了历史时间的超验经验”^[30]。

亚里士多德的情节化或叙事理论的辩证法,作为一种叙事类型与历史编纂结构是一致的,历史本身通过辩证叙事才变得可见^[31]。具体来说,在情节突变中,逆转在两个方向上都是可能的,故而这里确立成功与失败的辩证法是必要的。在这一情况下,情节突变的辩证法就是一种对立统一、一种结构,此结构中情节突变的两种情形可能会发生重叠或深刻的认同,辩证法于是被理解为两种情形的共存和融合,它不单单是关于失败或成功的经验,而是成功同时也是失败,失败又意味着成功。比如《埃涅阿斯纪》所要解决的问题正是要在成功和失败、荣耀和悔恨之间建立一种辩证的融合,它是对帝国的历史与血腥的一次调和,“可以说是对真实矛盾的一次想象性解决和对立面的一次成功统一”^[32]。在结构上,《埃涅阿斯纪》将罗曼司作为史诗的对立性补充,两者紧密地融合在一起,超越了《荷马史诗》的二元论。其前半部借用了《奥德赛》的漂泊模式,后半部则借用了《伊利亚特》的征服和战争模式,《荷马史诗》的两个方面或范式支配着《埃涅阿斯纪》的整个叙事结构,《伊利亚

特》中的胜利者正是《奥德赛》中的失败者，而埃涅阿斯同时充当了这两个角色，史诗和罗曼司的对立变为一种统一，肯定和否定变成了相互转化的矛盾体，情节突变于是成为一种记录了肯定与否定的深度含混并投射在时间的连续性中的辩证法和叙事形式。

情节突变中的“发现”这一视角为历史编纂叙事和虚构叙事同样提供了新的动力，从辩证法和唯物主义观点来看，它意味着在官方叙事背后被压制的他者的发现。在李维的《早期罗马史》中，最显而易见的元老院和平民之间的阶级斗争被描写出来，斯巴达起义的爆发意味着在城邦贵族永无止境的政治斗争背后，突然出现了一个新的集体形象——奴隶。根据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这一新的群体代表了现实世界一切生产性力量和最为充实的内容，它构成了历史发现和识别的有力形式，提供了对历史真实的一瞥。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中确立了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对立，而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他将退伍军人、流浪汉、贫民、失业人员、小偷、罪犯等统统列为流氓无产阶级。对流氓无产阶级的重新发现再利用，在此后葛兰西的“臣属性”（subalternity）概念中得到重视，它将与资产阶级对立的范畴扩大了，包括了广大农民在内的无产阶级，因此农民起义变成了对整个固化阶层的一种逆转，它作为各阶级背后通常被遮盖的阶级，突然成为带动世界革命的催化剂。在今天，“发现”完成了一种构成性操作过程，曾经沦为自然之飞地的非洲，在全球化的蔓延中正等待被发现。全球国家和地区在晚期资本主义进程中的结构性地位，必须被重新概念化，在认知意义上重新绘图，并将其置入一种晚期资本主义或全球化的叙事之中，“我们将发现理解作为一种理论性生产行动，在这里新的人物被生产出来以供我们的集体性发现、政治性发现以及识别之用”^[33]。

怜悯是继情节突变和发现之后的又一个重要环节。怜悯并非一种情感或情绪，而关乎事件，它将情节突变和发现统一进一个独立的现实中，并呈现为整个过程本身的表象。借助怜悯来思考历史，可以将历史视为矛盾的一体化过程，它借助各

种多样性的交叉，从而在哲学尤其是在文学中被呈现出来。历史的解放运动将诸多局部历史——各个部落的历史、各种正在消失的民族或记忆的历史等加以摧毁，并统一到一个单独的世界系统中。历史的显现依靠的正是这个进程。詹姆斯继续将怜悯的时刻和历史进行相互解释，并通过怜悯的物化特征使历史显现，“怜悯概念的表现性优势实际上在于其至少能够暂时将历史物化，用自身的力量迫使其作为一个实体显现而得以可见，这一使众多看似无关的历史趋势和潮流聚合的瞬间，可以被视为它们临时的（甚或刹那间的）统一”^[34]。怜悯作为一种事件，是独特性和普遍性之间的交叉，这种瞬间的、临时的统一，此刻由多元复杂而重新变为单一实体，因此同时被赋予了肯定和否定的双重性质。作为否定或肯定的瞬间它又将在更大的辩证法中继续，并被反复统一进新的更高的层面。詹姆斯认为这是对这个星球更多延伸部分的合并，一种不在场对在场、远方对近处、外部对内部的内在化和不断创造性关系。这个单一实体的双重视角可以让我们交替性地将它看做一个系统和一个事件的辩证互动。系统与事件构成了对立统一，系统作为总体性阴谋是一种制约，事件则可以被解读为自由和可能性的表达，它不断对系统产生冲击并扰乱陈旧的系统，又不断被系统整合进内部，生产出新的系统和事件。詹姆斯将怜悯这一瞬间时刻的肯定和否定效价转变为个体和集体之间、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对立，于是出现了个体与集体无休止的交替转变，且始终保持一种开放姿态的、历史的运动。在这一辩证运动中，历史的多样性标识了其空间或共时性特征，统一化运动则显示了时间或历时的维度。历史作为连续的时间和空间模型，出现在诸多多样性背后，成为一种绝对的视域。

根据詹姆斯的现代性叙事和转义理论，资本主义的各种文化现象与其经济基础存在着深层的辩证关系，资本主义的不同阶段——市场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跨国资本主义所衍生出的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不同类型的文化风格，每一种都反应了自身社会基础和特定生产方式的特征，或者说任何一种个体生产方式都投射和暗示着这种生产方式的整个序列，任何个体欲望都投射了

整个社会历史的重影，一切文化制品的内涵最终都不能逾越历史这个绝对的视域。但历史的显现必须通过叙事才能恢复其总体性面貌。通过亚里士多德的叙事结构，詹姆逊论证了以下过程，即诸种充满差异性的历史在不断交叉、结合中被统一进一个单独的世界系统，它以一种自我扩张与向内席卷的方式向未来摆动，并逐步吞噬着更加庞大的外部世界。作为一个连续推进的时间和空间机器，整个资本主义历史都不断重复着被改造过的黑格尔的辩证法模型。

结 语

针对黑格尔的“同一性”“历史终结论”等命题在当代注重差异的理论家那里所遭遇的激烈批判和否定，詹姆逊为黑格尔提出了诸多辩护。这些辩护基于对黑格尔思想的批判性吸收、扩充和发展，尤其是对辩证法的继承、改造，以及与历史化的融合，最终构成詹姆逊整个文化批评事业的哲学基础。只不过詹姆逊承袭了黑格尔抽象的肯定与否定模式，挪用了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最终却又将其现实的具体情境抽离，形成无内容的形式，他对集体和历史的绝对化凸显超越了任何个体，也由于明显的政治倾向遭到不少批判。历史哲学家安克斯密特认为，詹姆逊没有避免一种误读，即认为斯大林体制、古拉格与大饥荒等都是合理的，借助成功与失败的辩证法，詹姆逊甚至认为斯大林主义某种意义上是成功的，如集权模式使苏联从落后的农业国家实现了发达的工业化。他不仅没有为苦难中无辜死去的千千万万个体表示一点怜悯与悔恨，反而将此视为历史理性运作过程中的合理存在^[35]。当然这也正是黑格尔思想本身遭遇各种困境和批判的地方。在当代全球化的历史语境中，詹姆逊单一的现代性和历史效价理论同样忽视了总体性视域中的多元与差异，抹除了诸多无限且不可被同一化的“他者”，某种意义上构成了一种新的强权政治。

可以说，詹姆逊的马克思主义面孔背后徘徊着一个挥之不去的黑格尔的幽灵，这使他成为了一个“黑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者”^[36]，也使其文化批评打上了浓厚的形式哲学意味。但值得肯定的是，

“詹姆逊呈现了一个几乎是后现代的黑格尔、一个全球化时代的黑格尔——正是他在其早期作品《精神现象学》中……创造了一个十分契合我们当下时代理论关怀的动态的、开放的思想系统”^[37]。詹姆逊摒弃庸俗的目的论，将资本主义视为一个开放的体系，时间或历史随着辩证法的扩充而拓展，形成了一种关于资本主义空间辩证法的理论体系。或许他最重要的贡献就是对黑格尔辩证法在时间和空间方面的拓展与历史化策略，并使之成为理解当代资本主义历史及其文化的理论依据。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伦理转向语境中的历史书写研究”(项目编号20YJC75105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1] 佩里·安德森:《后现代性的起源》，紫辰、合章译，第13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

[2] 参见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利《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张志斌译，第238—251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

[3] Alan Norrie, “Who Is ‘The Prince’?: Hegel and Marx in Jameson and Bhaskar”, *Historical Materialism: Research in Critical Marxist Theory*, vol.20, no.2, 2012, p.85。拉卡普拉也认为，詹姆逊与卢卡奇和萨特一样，很大程度上仍停留在黑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内部。参见Dominick LaCapra, *Rethinking Intellectual History: Texts, Contexts, Language*,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p.254。詹姆逊不仅频繁挪用黑格尔的“逻辑”，也喜欢使用黑格尔的一些基本概念，其关于全球化的论述基本上是对黑格尔理论的再现。

[4] Alan Norrie, “Who Is ‘The Prince’?: Hegel and Marx in Jameson and Bhaskar”, *Historical Materialism: Research in Critical Marxist Theory*, vol.20, no.2, 2012, p.75。

[5] 詹姆逊:《语言的牢笼——马克思主义与形式》，钱俊汝、李自译，第262页，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

[6][7][22][24][30][32][33][34] Jameson, *Valences of the Dialectic*, London: Verso, 2009, p.286, p.287, p.452, p.70, p.552, p.559, p.582, p.587。

[8] 詹姆逊:《布莱希特与方法》，陈永国译，第9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9] 伊格尔顿:《我们必须永远历史化吗?》，许娇娜译，

《外国文学研究》2008年第6期。

[10] 参见 Dominick LaCapra, *Rethinking Intellectual History: Texts, Contexts, Language*, chap.7; Dominick LaCapra, *History, Politics, and the Novel*,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p.3。

[11] 参见海登·怀特《形式的内容：叙事话语与历史再现》第6章，董立河译，文津出版社2005年版。

[12] Bertell Ollman and Tony Smith (eds.), *Dialectics for the New Centur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Introduction", p.4

[13] 参见 Bertell Ollman, "Why Dialectics? Why Now?", in Bertell Ollman and Tony Smith (eds.), *Dialectics for the New Century*.

[14] 詹姆逊：《黑格尔的变奏——〈论精神现象学〉》，王逢振译，第92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15] 詹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唐小兵译，第14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6] 詹姆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张旭东编，陈清侨等译，第321页，三联书店2013年版。

[17] 资本主义的后现代阶段也是空间化或全球化阶段，它是资本主义矛盾不断转移和扩大的结果，列斐伏尔认为正是通过对空间的工具性利用，资本主义将实践中生产工具的占有和管理问题转移了，把矛盾扩大了而不是取消了。参见列斐伏尔《空间与政治》，李春译，第113—11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18] 大卫·哈维：《后现代状况》，阎嘉译，第409页，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19] [35] Frank Ankersmit, "The Dialectics of Jameson's Dialectics", *History and Theory*, no. 51, (February 2012), p.91, p.105.

[20] 大卫·哈维：《新帝国主义》，初立忠、沈晓雷译，第94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21] David Harvey, "The Dialectics of Spacetime", in Bertell

Ollman and Tony Smith (eds.), *Dialectics for the New Century*, p.116.

[23] 詹姆逊的《辩证法的效价》可以被读作詹姆逊对一种与古老的时间辩证法相对的新类型的空间辩证法的介入和阐述。相关研究还可参见 John Grant, "Late Dialectics: Marxism, History, and the Persistence of Fredric Jameson", *Telos*, no.154, (Spring 2011).

[25] 詹姆逊：《单一的现代性》，王逢振、王丽亚译，“前言”第24页，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26] 关于单一现代性的说法曾引起巨大争议，即便是在西方学者眼中也难免被戴上殖民主义思想的帽子，如罗伯特·扬认为詹姆逊的历史不过是白人的历史、资本主义的历史，而不是世界的历史。参见罗伯特·扬《白色神话：书写历史与西方》第6章，赵稀方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27] Maria Elisa Cevalco, "Book Review: A Singular Modernity: Essay on the Ontology of the Presen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vol.13, no.4, 2005, p.353.

[28] 詹姆逊：《单一的现代性》，王逢振、王丽亚译，“前言”第24页。也可参见詹明信等《回归“当前事件的哲学”》，《读书》2002年第12期。

[29] 亚里士多德：《物理学》，张竹明译，第127页，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31] 詹姆逊在《什么是辩证法》中概括地将亚里士多德的情节化理论运用到历史编纂结构中，认为辩证法实际上就是一种叙事。可参见詹姆逊《什么是辩证法》，王逢振译，《西北师大学报》2005年第9期。

[36] 詹姆逊在《辩证法的效价》中坦言自己主张一种“黑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参见 Jameson, *Valences of the Dialectic*, p.100.

[37] Robert T. Tally Jr., *Fredric Jameson: The Project of Dialectical Criticism*, London: Pluto Press, 2014, p.158.

[作者单位：惠州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

责任编辑：何兰芳